



从大寨到大邱庄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 陈永贵说：合作化是不流血的战争 / 从“家长作风”到“封建皇帝” / 中国农村改革与大邱庄 / 今日大邱庄是谁家天下 /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也得垮！”

范银怀◎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从大寨到大邱庄

范银怀◎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大寨到大邱庄/范银怀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80234-974-2

I. ①从… II. ①范…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5018 号

书 名: 从大寨到大邱庄

著作责任者: 范银怀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974-2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序

◎ 吴 象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通过“农业学大寨”和后来的“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体制“左”的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人民公社否定了自己而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大邱庄较早总结了学大寨的教训，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观念，及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使农民尽快走向致富之路，曾是全国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第一村”。它也经历过挫折，其经验和教训都极为宝贵。范银怀同志写的《从大寨到大邱庄》忠实地记录了大寨、大邱庄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变迁，如实反映了中国农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曲折过程，从中探索出中国农民奔向小康生活的路径，因此，可说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

范银怀同志是新华社的一位资深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五六十年代我和他分别在山西日报与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这两家在革命根据地是“一家”，入城后才分开，但还住在一个大院。我比他大十来岁，做记者也早十来年。当时我主管报纸的采编业务，照应整个版面，有时参加一些重点采访。他勤学好问，人又随和，因此不久就同他熟了。1964年秋后至1965年夏初，在原平县平地泉大队参加过一期“四清”蹲点，约八九个月之久，我们队部几个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条炕。晚间谈完工作就躺在炕上闲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之所

至，无所不谈。他常到大寨采访，又随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全面调查，对大寨怎样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内情有所了解，在赞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高产田的同时，他向我说李顺达等农业劳模曾发现大寨耕地亩数不实等问题。当时尽管毛泽东学大寨的号召还没有公布，但是内部已听到有关指示，大寨在全国声望一天比一天高，不料这位报道过大寨的记者，却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大寨和陈永贵本人的一些问题。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曾劝他正式写成《内参》向总社报告，并由此发现，他表面上似乎组织性纪律性不那么强，有点小自由主义，但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去大寨采访，并被新华社总社指定参加了中央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道，对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的“左”的路线给农民造成的危害时有所闻。他可以说是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80年代，我被调到中央农口工作，退出第一线后，作为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的成员，曾和范银怀一起先后到河北、广东、海南、黑龙江、新疆、天津考察过乡镇企业发展。因为有老朋友作伴，旅途特别愉快，探讨问题也无拘无束，随意发挥，毫无顾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也使我们对各自亲身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我曾鼓励他下些功夫，把陈永贵和大寨、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异同作个分析比较，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写成一本书，这对于帮助读者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是有助处的。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的兴起和衰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和人民公社的兴衰联系在一起。1958年兴起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批评人民公社搞得太快了，太早了，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结果，全国继续反右倾，高指标，高征购，1960年下半年出现大饥荒，非正常死亡达到2000万人。“五风”严重的安徽搞起责任田。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错误，也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60条》下放公社权力，划小核算单位，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民说：“要想吃饱肚，土地包到户”，全国刮起了“单干风”。1962年在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刘少奇讲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三分是天灾，

七分是人祸”，这一下更触动了毛泽东。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人民公社已成为僵死的体制，丧失了活力，不打破这个僵死的体制，中国农业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不承认这个失败，相反指控刘少奇等讲话是否定人民公社的一股“黑风”。1962年秋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说，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能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大寨正符合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经毛泽东审定的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毛泽东为什么要树立大寨这面红旗？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毛泽东经过长期选择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优越性，体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体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大寨就是阶级斗争。他想通过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通过“四清”，只解决基层的问题不行，必须打倒上面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内容，在全国农村进行了一场大浩劫。

学大寨运动纳入了“文化大革命”轨道，使“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突出的要算“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

大寨这个小山庄，原来只有78户人家，是个独立核算单位。是个“大小队”，也可以说是个“小大队”。公社化后一直是大队核算，其实同一般生产队（小队）核算规模差不太多。1963年遭灾后，所建的新房全部由集体修建，从此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后来管理进一步加强，几乎是完全限制了社员发展各种家庭副业，没有户养的猪羊，不准社员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这些本来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大寨这样做效果如何先不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这些便变成中央的政策向全国农村推广，发展到荒唐的程度。除了集体分给社员的粮、钱、物外，凡是个人增加的东西，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当做“尾巴”加以割除。普及大寨县的口号提出后，“割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更由昔阳而山西而全国，危害极大。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进一步提出什么“批集体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把“批资、堵路、割尾巴”从集体外部转入内部，推向新的高潮。全县到外地搞运输的马车收回社队，向全国介绍了“马车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的所谓经验。有些大队只允许“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可谓把“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左”倾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是否可以不通过发展商品经济，直接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越是贫穷的国家越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说“一穷二白”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此，革命胜利一旦到手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由限制、改造到“割尾巴”，这正是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实践告诉人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实际，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使共同富裕的理想变为普遍贫穷的现实。

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维持着所谓的“大好形势”。当年有一个说法“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搞农业”，在昔阳以至山西一度颇为流行。这是大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典型全部经验的精髓所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已经是二等公民，经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想当二等公民也不可得了。

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但是沉痛的教训必须记取。不记取这个教训，就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大邱庄较早接受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冲破了“两个纲”的束缚，将联产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乡镇企业，对中国农村改革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禹作敏封建家长作风严重，触犯了刑律，犯了罪，判了刑。当时国内不少人都认为，禹作敏垮了台，整个大邱庄就要垮台，中国的乡镇企业要受很大影响。天津市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采取了一些好的政策，严格地掌握界限，不扩大，不株连，而且原来一些好的东西尽量予以保留，在这个基础上把大邱庄的做法加以改善。因此，大邱庄经历了禹作敏事件后，不但没有垮台，而且比以前发展得更好、更健康了。现在大邱庄已经成了有3万人的城镇，吸纳了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劳动力。这在中国，在世界上讲都

是不简单的。它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验很好，教训深刻，影响很大，这个经验教训总结好了，是一笔天津独有的精神财富。

当前农村改革深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使人感到大寨、大邱庄的经验教训还有继续反复咀嚼、深刻记取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指出，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确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只有反复咀嚼、深刻铭记这些历史教训，才能引导农民沿着正确道路，建设小康社会。

引言

“《从大寨到大邱庄》怎么想都是个好题目，值得费时间好好写一写。主要是选好角度，扩展视野，表达什么主题，能吸引读者，成为一本受人喜爱的读物，并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现代化。这要请你多费脑筋了。”1996年7月15日，在美国探亲的吴象同志，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长信中特意写了这样一段。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随当时中央有关人员受中央领导指示，解剖过两个“麻雀”，一个是“大寨”，一个是“大邱庄”。这两个典型也是吴象同志熟知的。

大寨是太行山中属于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七八十户的村庄，是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先进典型。1964年3月，毛泽东听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又看了通讯《大寨之路》后说：“看来农业要靠大寨”，接着周恩来总理派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调查，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调查。大寨在毛泽东审阅的周总理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在全国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长达15年之久。

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团泊洼的一个五百多户的村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下产生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典型。这个典型引起了邓小平的注视。1985年3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大邱庄视察后，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吴象留大邱庄继续调查，我也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陪同调查，又解剖了一个“麻雀”。大邱庄成了中国农村的“首富村”，吸引了千百万农民。

1995年3月，中央农口几位专家领导吴象、姚力文、郭书田、许人俊，应天津市静海县政府邀请，参加“静海县发展战略研讨会”。他们有的参与中央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深刻认识。我有幸参与了这项活动。在驱车到大邱庄的路上，他们知道我60年代采访、调查过大寨，80年代采访、调查过大邱庄，兴味盎然，建议我写一本《从大寨到大邱庄》的书。解剖这两个村庄，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他们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实写出这两个村庄的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农村改革很有价值。在这些专家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将这两个农村典型和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写出来。

本书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陈永贵和大寨”，后一部分是“禹作敏和大邱庄”。

从大寨到大邱庄是中国农民共同走过的路，它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中国农民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实践和创造，促使我重新学习，辨别是非，探索农民奔小康的道路。

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时启奕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范银怀

2013年9月于天津新华园

目 录

上篇 陈永贵和大寨

第一章 毛泽东说：“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3
三个增产数字和三面红旗	4
毛泽东批示：“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5
陈永贵成了反修防修“活教材”	12
“三不要”成了“自力更生典范”	17
“穷山沟出了好文章”	20
“50 知天命，人定胜天”	27
第二章 周恩来派廖鲁言到大寨调查	31
陈永贵是大寨的“好当家人”	32
蓄水保墒是建设大寨田的“真经”	34
“不要再犯 1958 年的错误！”	37
农业差别很大，不能生搬硬套	43
周恩来总理总结出大寨经验	45
第三章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47
全国劳模李顺达等的眼力	49
陈永贵“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54
毛泽东批刘少奇，树大寨红旗	57
如实反映情况者均遭祸害	61

第四章 陈永贵说：“合作化是不流血的战争”	63
“地主是狼，变不成羊”	64
“我一为祖上争光，二为穷人谋利”	67
“动摇私有制”，争办合作社	72
“一夜之间实现了一村一社”	76
办“联村社”“升级”失败	80
“生产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81
“阶级斗争要世代传下去”	87
第五章 “公社靠不住，单干是出路”	89
“三面红旗同时升起”	90
纠正“五风”，出现分歧	96
“白草、黑市、小块地”救了命	97
“要想吃饱肚，土地分到户”	99
第六章 从大寨大队到大寨县	103
“大寨已经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05
陈永贵说：“我们要管理国家大事”	107
“这是拥护和反对‘三面红旗’之争”	111
从大寨大队（村）到大寨县	114
“永贵是无产阶级权威！”	117
支持社员搞“小自由”的书记成了“活靶子”	119
批“山沟里的资本主义”，收农民自留地	122
批“家庭里的资本主义”，“一户一猪一树”	124
批“庄稼搅买卖”，关闭农贸市场	125
“凡是大寨的就照搬”，各行各业学大寨	127
第七章 周恩来营救陈永贵	129
“要站在刘格平一边！”	130
江青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	132
传达周恩来“四点指示”	134
“互相残杀”者的下场	137

第八章 “大寨工”和干部参加劳动	139
毛泽东称赞大寨记工法	140
“对大寨记工法，看法不同”	142
陈伯达说：“这对消灭贫富差别有好处”	144
以干部“无形的威力”强化劳动管理	146
“我死了，会有人挖我的祖坟”	148
“斗私批修”，“一心为国家”	150
“先公后私”与“大公无私”的一场争论	154
陈永贵阐述大寨记工法好处	155
“大寨工”也遭到大寨人反对	156
第九章 “我们就是要穷过渡”	159
“没有产，光共产”	160
“要走大寨路，先建大寨式党支部”	164
“想新的，干大的”	167
纪登奎刹“新五风”	169
撤掉不学大寨的“五种人”	172
周恩来提出：“重要的是划清政策界线”	176
“照发”的是推广大寨极“左”经验文件	178
“阶级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	179
毛泽东从大寨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	181
越念越受穷的一本“大寨经”	185
第十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堵资本主义路”	189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	190
陈永贵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194
“共产主义就在今天”实现公社所有制	198
“建共产主义大厦”，挖社会主义墙脚	201
高积累，高征购，全年人均一斤油	203
“创大业”和“共产风”	204
发展商品生产和“堵资本主义路”	206
大寨坚持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	210

领导人“主意”变成“社会主义”的危害	212
“小生产”成了“全面专政”对象	214
贾进财成了当然“走资派”	216
“趁穷过渡”是民粹主义	218
第十一章 西水东调和“共产主义工程”	221
搞“花架子”，随意增改项目	224
批“封建家长式统治”，“文到之日”停建	225
“政治工程”的苦果	226
讲究实效，十八年后再度上马	228
第十二章 “大寨这个典型很好！很好！很好！”	229
“三三制”和“大寨区”、“大寨省”	230
大寨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	231
全党全国总动员，五年普及大寨县	234
“推广大寨经验，要调大寨式干部”	235
华国锋继续高举大寨红旗，提出分批“过渡”	236
江青的“点”为什么从小靳庄到了大寨？	237
邓小平主持工作，江青讲：“中央有人架空毛主席！”	239
毛泽东病重，江青高喊：“女的要掌管天下！”	241
汪东兴登上虎头山，完成毛泽东遗愿	242
第十三章 从“家长作风”到“封建皇帝”	243
“救世主”的威严	245
向“毛主席请罪”和黑材料事件	246
周总理说：“顾全大局，维护大寨红旗”	247
毛泽东反对批极“左”，陈永贵坚持批右倾	248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251
“政治需要”和大寨县虚报产量	253
为什么与极“左”路线一拍即合？	254
“人怕阳性倒，地怕爬地草”	255

第十四章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257
“谁是谁非，让实践作出公正结论”	258
“尝一尝‘大包干’的果实！”	260
“阳关道”与“独木桥”	261
“农民像解脱绳索的小鸡，活蹦乱跳”	264
“大寨式干部”在推广大寨经验中受阻	266
拿掉“顶门棍”，思想得解放	267
“驯服工具”和实事求是	270
第十五章 “剪刀差”和大寨人泪流满面	273
大寨仍是自然经济	274
“自力更生是有条件的”	275
一笔清单否定了大寨的“自力更生”	276
令大寨人心碎的“两毛二分六”	280
第十六章 大寨农民的“自由”和新生	285
从“两个凡是”和“两个土凡是”中解放出来	287
从人民公社“天堂”走出的大寨人	289
“改革开放使大寨获得新生”	291
“大寨纳入了当代世界的轨道”	292
附录 大寨之路	295

下篇 离作敏和大邱庄

第一章 “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	311
“阶级斗争为纲，整得人心惶惶”	
“以粮为纲，搞得穷当当”	312
从“地主兼资本家”悟出发展商品经济	315
起用在城市工厂干过的“能人”	318
刘万“能”兄弟和大邱庄的发家工厂	320

“我只管两条：一是任命厂长；二是确定厂长劳酬”	322
“大包干”出现“母鸡下蛋”，一厂变四厂	324
抢占市场，“限你一个月把它攻下来！”	326
“一切向钱看”，向天津发布“人才招标”	329
“都说你不行没关系，我说你行就行！”	330
第二章 市场中求发展 “能人”先富起来	333
利用“双轨制”，“低进高出”赚大钱	334
“夹缝中求生存”，市场中求发展	335
“感情投资”和“绝对保密”的信息费	336
国营企业厂长对大邱庄企业作出经济分析	338
“能人先富起来”	338
城市知青返乡，国家干部回乡	339
“高工资、高消费”，名扬全国	341
第三章 “统一致富”和大邱庄模式	345
“以工建农”，实现农业现代化	346
专业承包，种田能手富了起来	347
既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有家庭联产承包的积极性	349
“大邱庄模式”仍是“政企合一”	351
第四章 改革功臣，“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罪人？	353
“行贿受贿等着看，投机倒把不能办”	354
“三就地”和市委书记的两袋茶叶	356
于光远带来改革的春风	357
“只要市场需要，农村照样可以搞钢铁工业”	359
禹作敏对于光远说：“你给我壮了胆！”	360
今天的大邱庄和明天的静海县	362
大邱庄吸引着全国农民	363
邓小平说：“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	364
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说：“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	365
“你们收入超过了国家主席！”	368

第五章	万里、胡启立引导改革方向	369
	“城市改革开始了，乡镇企业如何发展？”	370
	胡启立以大寨为镜告诫大邱庄	372
	深夜促膝谈心	373
	“我用的人，民主选举产生的一个也没有”	377
第六章	中国农村改革与大邱庄	383
	“乡镇企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384
	乡镇企业和生态农业	384
	从大邱庄看全国	386
	从全国看大邱庄	390
第七章	“官商一体”和新权威主义	395
	从“人情税”找到聚财“捷径”	396
	回答总书记的问题：“为什么划小核算单位能翻番？”	397
	天津市市长现场办公解“难题”	400
	“他们工资半明半暗，派出所所长工资由我开”	401
	“这是贪污腐化的根源”	401
	“这就是新权威主义？”	403
	“全国人大代表不选我，选谁？”	405
	“共产党爱算总账，我是谁招待谁花钱，集体不下账”	407
	薄一波赞同的“向钱看”	408
	“国营企业争不到的，为什么我都有？”	409
	“与首钢联合，他们从这里收的钱可以发奖金”	410
	“物价上涨，除了穿衣，都涨不到我身上”	412
第八章	今日大邱庄是谁家天下？	415
	“劳资矛盾”和扩大保安人员编制	416
	“利益分配”和社会安定	418
	“谁得民心谁接班”	420
	社会学家点评	420
	撤掉“不吹我的号”副总经理张玉英	421
	第一次打人致死案和“游行示威”	422